



**HAL**  
open science

# 从一份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手稿浅谈清初西方在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

Huiyi Wu

► **To cite this version:**

| Huiyi Wu. 从一份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手稿浅谈清初西方在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 2015. <hal-01246643>

**HAL Id: hal-01246643**

**<https://hal.science/hal-01246643>**

Preprint submitted on 18 Dec 2015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

# 从一份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手稿浅谈清初西方在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sup>1</sup>

吴蕙仪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博士后, 巴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附属研究员)

明末清初是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欧洲传教士的到来, 不仅将天主教与西学传播到了中国, 也使欧洲首次系统性地获得了关于中国的第一手知识。而且, 作为异文化背景的外来者, 欧洲传教士的视角往往不同于国人, 因而也为明末清初的历史事件和社会文化提供了不少极为独特和珍贵的见证。传教士对汉语的纪录即属此例。他们不仅采用拉丁字母记录汉语口语发音, 为当代学者还原清初汉语口语提供了有力的作证<sup>2</sup>, 也为汉语考订了最早的成文语法。关于传教士的汉语语言学成就, 国内外学者已多有大量深入研究, 有汉语语法传世的传教士生平行迹、传教士语法的基本范式结构及其演变、著作的成书过程、传教士的个人创见都已经得到了细致的梳理<sup>3</sup>。但与后世职业汉学家不同, 传教士编纂语法并非为学术而学术, 而是出于自身在华生活、学习汉语的实际需要。这些语法书是著述, 但首先是教科书。那么, 传教士是如何从这些“死”的书中学到“活”的汉语知识的?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研究者却时常面临史料难征的问题<sup>4</sup>。自然, 要想复原这一教学

---

<sup>1</sup>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曾先后承蒙以下学者的指导、点评或惠赐资料, 特此鸣谢(按姓氏字母顺序): Marie-Noëlle Bourguet、Liam Matthew Brockey、Ad Dudink、Noël Golvers、Ronnie Hsia Po-Chia、Catherine Jami、Dominique Julia、李毓中、Federico Massini、Luisa Paternicò、Jacques Revel、许明龙。Davide Duina、João Pedro Gomes、Nathalie Marques Leal、Roxana Nakashima对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史料的解读提供了帮助, 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文科学院(Istituto Italiano di Scienze Umane)和法国国家科研署(Agence nationale des Recherches)“16-20世纪的人物行迹与科技知识流动”课题项目(ANR 09-SSOC-004)提供了经费赞助, 一并鸣谢。本文曾以英文发表于2011年比利时鲁汶南怀仁学会大会, 法文版将作为笔者2013年的博士论文一部分, 由Honoré Champion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吸收了一些新材料(尤其是李毓中教授2014年惠赐的材料和论文), 在保持原文基本立论的同时有一定幅度改写增删。

<sup>2</sup> 如美国学者Coblin对清初汉语官话基准音的研究。Coblin, W. S. (1998) "Francisco Varo and the Sound System of Early Qing Mandarin."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8(2): pp. 262-267.

<sup>3</sup> 这方面截至2003年的研究综述可见Standaert, N. (ed.) (2001).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635-1800*. Leiden, Brill. pp. 861-868。近几年国内外问世的还有Paternicò, L. (2013). *When the Europeans Began to Study Chinese*,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KU Leuven; 李真, 《马若瑟<汉语札记>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14; 许明龙, 《黄嘉略与法国早期汉学(修订版)》, 商务印书馆, 2014。杨慧玲, 《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12也涉及明末清初。

<sup>4</sup> 这方面的研究包括Girard, P. (2008). "L'apprentissage et la connaissance du chinois par les religieux ibérique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in A. Campos, S. Ventura da Silva & S. Pimentel Franco (éd.) *Impérios, Religiosidades e Etnias*, Vitoria (Brésil), UFES: p. 109-124; 李真, 《简论明末清初在华西

---

实践过程，少不了对教科书本身设计构架的充分理解和把握，而教科书中有时也包括编者的使用建议，可为教学法的还原提供一些线索。但严格来说，任何书籍或文本，如无周边材料佐证，其存在本身并不证明其曾确实被传播、阅读、接受，编者的指导性意见也不可能涵盖使用者经验的多样性。只要回想我们本人学习或教授外语的经历就可以明白，同样一本教材，获得的渠道可能截然不同，学习的进度可以快慢不等，学生可以闭门自学或随堂听课，教师可以照本宣科也可以自由发挥，可以书面口语并重也可以只顾一端。学者若要想回到历史场景，还需要依靠两类材料的旁证：一是学习者或观察者的描述，二是课堂笔记、习题簿一类直接产生教学过程中的文本。但这两类史料都十分散碎稀少，尤其是初等教育阶段的笔记、作业，绝少有经历数百年风雨保存至今的。这也是东西方教育史均普遍的困难，并非传教士研究所独有。以法国为例，近年来对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中学教育实践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所依据的学生习题、试卷往往是因为纸张本身被挪作他用而意外保存至今<sup>5</sup>。

应该说，传教士与其欧洲同僚的私人通信中，对其汉语学习的经历是有一些描述的，前辈学者也有留意。这里试举较著名且生动的两例：其一是传教士中学习汉语的第一人，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1581年，他开始汉语学习后不久，向罗马总会长报告：由于与澳门当地的中文教师之间没有任何共通的语言，后者只能采取一种类似于看图识字的“荒唐”的教学法：在纸上画一匹马，同时口中发“马”音<sup>6</sup>。其二是捷克传教士严嘉乐（Karel Slaviček, 1678-1735），他1716年抵达北京后不久即致信国内同僚，兴奋宣称“汉语语音对世界各国人都很难，唯独对捷克人或波兰人却一点也不难”，并举例说明希腊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德语的某些发音和构词法与汉语如何有相似之处<sup>7</sup>。两

---

方人的汉语教与学》，载《多维视野下的对外汉语教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Hsia, R. P.-C. (2011).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Missionary Strategies in China", in C. Castelnau-l'Estoile, M.-L. Copete, A. Maldavsky & I. Zupanov (éd.) *Missions d'évangélisation et circulation des savoirs, XVIe-XVIIIe siècle*, Madrid, Casa de Velazquez: pp. 211-229；Wesolowski, Z.、魏思齐[编]，《辅仁大学第六届汉学国际研讨会：西方早期（1552-1814）汉语学习和研究》，辅仁大学华裔学志丛书系列10，辅仁大学出版社。

<sup>5</sup> 对本文最有借鉴意义的应属Marie-Madeleine Compère等人对16-18世纪法国耶稣会书院学生拉丁文启蒙的研究。Compère, M.-M., Pédeflous, O. et al. (2009). "Éléments pour l'histoire d'un genre éditorial. La feuille classique en France aux XVI<sup>e</sup> et XVII<sup>e</sup> siècles." in *Histoire de l'éducation*, Vol. 124: pp. 27-49; Compère, M.-M. & Pralon-Julia, D. (1990). "Les exercices latins au collège Louis-le-Grand vers 1720", in *Histoire de l'éducation*, Vol. 46 (mai 1990), pp. 5-52。后者依据的学生拉丁文考试试卷之所以被保存至今，是因为空白的背面曾被著名学者Jean Hardoin（1646-1729）神父用作稿纸。笔者感谢Dominique Julia教授在法国教育史方面提供的宝贵建议。

<sup>6</sup> Brockey, L. M (2007),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5*,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 246。

<sup>7</sup> 严嘉乐从广州寄给布尔诺尤利乌斯·兹维克，1716年10月24日，《中国来信1716-1735》，大象出版社，2002，丛林、李梅译，p. 16。周振鹤教授也曾指出这段材料对汉语教学史的意义。周振鹤，《〈中国来信〉读后》，《知者不言》，三联书店，2008，pp. 138-141。

---

者相比，前者抱怨入门之难，后者报告进步之速，但都是对某一特定时刻吉光片羽的速写，不是系统的描述，生动固不待言，却无法帮助我们在更长时段上，理解传教士汉语学习的复杂过程。

能够更系统深入地传教士汉语学习过程的史料也并非没有，如美国学者柏理安（Liam Matthew Brockey）《东游记（*The Journey to the East*）》一书中所披露的两份史料：首先是时任耶稣会中国负责人的李玛诺（Manuel Dias Sénior, 1559-1639）于1624年为新入中国的传教士制定的《在华学习大纲》<sup>8</sup>，以日常口语始，以儒家典籍终，前后分三个阶段，费时四年，期间专心学习，不参与传教，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份高标准、严要求的指导性文件在始终受人手短缺之困的中国传教团中曾得到认真执行。更能直接反映传教士学习实践的，是意大利传教士潘国光（Francesco Brancati, 1607-1671）在一部《四书集注》的书眉处逐日记录的其1637年5月至1638年1月间研读《大学》和《孟子》的进度<sup>9</sup>。这类新发掘的档案材料对传教士汉语学习提供了难得的内部视角。潘国光笔记更是弥足珍贵，因为明末清初大多数传教士都终老中国，读书笔记一类的私人档案，若无专人携回欧洲保存，最终难免在之后历代教案和清查教产的过程中湮没。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类材料集中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上半叶，即耶稣会传教事业开创者罗明坚、利玛窦（1552-1610）及其直接后继者活动的时期。目前学者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这一阶段。然而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是耶稣会汉学的一个高峰期，法国耶稣会集体撰著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等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在欧洲影响极大，其中大量内容直接译自中文，显然相关传教士的汉语水平也并非等闲<sup>10</sup>。他们的学习经验，应当不同于前辈：首先，经过半个世纪的摸索，传教士的汉语训练体系应当已经日臻成熟，摸索期和成熟期的经验显然不能简单通约。其次，目前有案可考的传教士汉语语法绝大多数成文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之后<sup>11</sup>，这些教学资源是早期传教士所不具备的。加之在华传教士群体的结构在17世纪下半叶有了很大变化，不再由耶稣会一统天下。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于1633年、法国外方传教会于1683年相继入华，法国耶稣会于1700年脱离葡萄牙保教权下的耶稣会中国

---

<sup>8</sup> Brockey 2007, pp. 255-263。原文标题*Ratio Studiorum para os Nossos que ham de Estudar as letra e lingua da China*（为需要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同侪制定的学习大纲），藏于里斯本Ajuda图书馆，编号49V。

<sup>9</sup> Brockey 2007, pp. 271-279。

<sup>10</sup> 关于《中华帝国全志》，参见蓝莉，2015，《请中国作证》，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

<sup>11</sup> 根据意大利学者陆商隐（Luisa Paternicò）统计，16-18世纪间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编纂的汉语语法，目前有迹可考的共16部，仅四部出现于1640年前（原文均已佚失），其中三部为在菲律宾华人中传教的西班牙多明我会士所作。L. Paternicò (2011). *Martino Martini's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Grammatica Linguae Sinensis*. Rome, Università Roma I-« Sapienza », thèse de doctorat, pp. 36-41。

---

副省独立<sup>12</sup>。这种新局面将如何影响传教士汉语教学知识的传承？

本文拟以梵蒂冈宗座图书馆（BAV）保存的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 1665-1741）档案为基础，探讨清初传教士的汉语学习问题。傅圣泽是在华传教士中颇具争议的人物。他 1699 年入华，属于一个所谓Figurists的小团体（通译为“索隐派”，或译为“符象派”）。其核心观点是：中国古经所载上古三代帝王事迹均非信史，而是对圣经新旧约故实的象喻（拉丁文*Figura*）。索隐派的是非正误牵涉甚广，中外学者已有不少研究<sup>13</sup>，本文不作讨论，而只需指出其带来的一项人事后果及其史料学意义：由于坚持己见而与法籍耶稣会同僚交恶，傅圣泽于 1720 年离开北京，在罗马度过余生，他携回欧洲的私人档案也得以完整保存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这在同时代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中是仅有的一例。这批档案数量巨大，内容丰富，除傅圣泽为其索隐派立场正名、为其与同僚纠葛的辩白之外，还包括不少罕见的关于传教团藏书以及日常生活的文献<sup>14</sup>。基于这批档案已有不少成果问世<sup>15</sup>。本文所依据的主要是编号为Borgia Latino 523 的一卷傅圣泽私人笔记。

#### 资料描述

Borgia Latino 523 卷保存状况很好，全卷 196 叶（正反两面作一叶），笔记的内容包括

---

<sup>12</sup> 根据1494年，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签署的《托尔德西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东半球的传教活动受葡萄牙王国保护，西半球归西班牙控制，因而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在华耶稣会传教士不分原籍国，均须取道里斯本，持葡萄牙护照，搭乘葡萄牙船只，经澳门入华。本文提到的意大利人罗明坚、利玛窦、捷克人严嘉乐均是如此，因而往往通称为“葡籍”耶稣会士。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起，亦有西班牙籍传教士（多属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通过菲律宾进入福建一带。十七世纪下半叶葡萄牙势力式微，后起的法国自1685年起，开始独立派遣资助耶稣会士入华传教并从事科学活动，后者搭乘法国船只，从法国直接起航，有独立经费、教堂、藏书、出版渠道，其独立地位于1700年得到耶稣会总部正式认可。康熙朝著名的宫廷传教士如白晋、张诚以及下文提到的傅圣泽、马若瑟、刘应等人均属法国传教团。

<sup>13</sup> 索隐派的几名主将已均有学者为之立传，可帮助理解其思想源流。柯蓝霓，2009，《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和著作》，李岩译，大象出版社；魏若望，2006，《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吴莉苇译，大象出版社；龙伯格，《清代传教士马若瑟研究》，李真、骆洁译，大象出版社，2009。

<sup>14</sup> 魏若望书未列出了其所寓目的全部傅圣泽史料，对后来者是极好的指南。魏若望，pp. 312-372。

<sup>15</sup> 除了魏若望《傅圣泽传》之外，较著名的还有史景迁的《胡若望的疑问》，以及2010年比利时高华士博士、2014年钟鸣旦教授根据傅圣泽档案中的中西文书单对其阅读范围所作的考证。Golvers, N. (2010). "Bibliotheca in cubiculo: the 'personal' library of Western books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J, in Peking (Beitang, 1720) and the intertextual situation of a Jesuit scholar in China." in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58: pp. 249-280; Standaert, N. (2014), "Circulating Chinese Books, Jean-François Foucquet's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in Europe", "Workshop on the Materiality of Chinese-Western Relations in the Ming Qing Period", Leuven, 26<sup>th</sup> May, 2014.

---

传教士名录、日记、书摘、通信、数学草稿以及与各种在华生活杂务有关的笔记，看似为散页装订而成，并无一定规律，纸张大小不齐，兼有中国竹纸和欧洲麻纸，双面书写，交替使用中国墨汁和欧洲墨水，标注了日期的文本（包括书信、日记）多在 1699-1701 年之间。根据其日记，傅圣泽于 1699 年 7 月 24 日抵达厦门港，随后的一年半间先后居住在厦门、漳州、福州，1701 年 3 月即被派往江西抚州独立传教<sup>16</sup>，则其此时应该已经度过了汉语启蒙阶段。

卷中与汉语学习有关材料主要有两部分：第 24-42 叶，第 69-140 叶。第 24 叶开始的第一部分题为 *Facilior et perspicua [sic] methodus ad linguam mandarinam addiscendam, a Reverendo patre f. [sic] Francisco Varo ordinus Praedicatorum in China vicario provinciali tradita anno sal. 1684* [至为简明的官话学习法，托钵修会中国副教省长、尊敬的万济国神父撰，1684 年译]。全篇套用欧洲语法概念解析汉语，按语法知识点为纲划分章节：名词（主格、属格）、形容词（比较级、最高级）、动词（主动态、被动态），介词、连词、否定句、疑问句，等等。最末附有一些社会语言学知识，如敬称和谦辞的用法。

标题中出现的万济国（Francisco Varo, 1627-1687），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1649 年经菲律宾入福建传教并终老于此。万济国语法是汉语语言学史和 17 世纪传教士汉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名著，此书脱稿于 1682 年，1703 年由其弟子，西班牙方济各会修士石铎禄（Pedro de la Piñuela）在广州以西班牙文刊刻，题为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官话的艺术），1793 年又有新的木刻版。此书流传甚广，根据目录学家考狄（或译高第，Henri Cordier）统计，截至十九世纪末至少尚有七部《万济国语法》由欧美图书馆和私人收藏<sup>17</sup>。2000 年，美国汉学家柯蔚蓝（South W. Coblin）以罗马科学院 Corsiniana 图书馆所藏 1703 年本为底本，出版了西班牙语影印版和英语译文对照的双语版，并已在 2003 年译成中文<sup>18</sup>。

基于学界对万济国语法的现有认识，1699 年入华的傅圣泽档案中出现其手抄本毫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目前所知的《万济国语法》十九世纪前的各版本均为西班牙文，而傅圣泽抄本为拉丁文！

应该说，万济国语法的这个拉丁文本的存在并非完全不为人知。魏若望神父所著的《傅圣泽传》书末所附手稿目录中曾予以收录（笔者正是通过这份目录才按图索骥找到该抄本），但只记录了标题，并未说明内文亦为拉丁语；白珊（Sandra Breitenbach）在万济国语法 2000 年影印版导言中也曾一笔带过地提及过这个拉丁文本，但未对其内容作任何讨论。最重要的是，二人均只是将傅圣泽抄本作为万济国语法存世的诸多本子之一对待，而没有关注其本身附带的历史信息：它是一个法籍耶稣会传教士在 1699 年入华之始抄写的。这在他的汉语入

---

<sup>16</sup> 魏若望，pp. 87-101。

<sup>17</sup> Cordier, H. (1924). *Bibliot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deuxième édition, supplément, tome I*.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e Geuthner, col. 1652 ff.

<sup>18</sup> Coblin, W. S. & Levi, J. A. (2000). *Francisco Varo'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1703: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姚小平，马又清中译本《华语官话语法》，外研社，2003。

---

门学习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继续检视手稿，在 20 多页中国地名、在华传教士姓名之后，手稿第 65 叶至第 140 叶（正反面书写）重新出现与汉语学习有关的内容。其中包括：三叶基本语法规则（f°65-69）、九篇虚拟日常情景会话（f°70-101v）、42 张专题词汇表（f°102-129v）、一份告解问答指南（f°130-140v）。语法部分为葡萄牙语撰写，十分简略，也以语法概念为纲编写。词汇表按主题编排，包括教堂、饮食、衣服、人身、树木、花草、动物等，对话部分每章围绕一个场景，包括“管堂中事”、“厨房的事”、“买办的事”、“库房的事”、“茶房的事”、“衣服帽房的事”、“看门的事”、“行水路船工的事”和“拜客问答”。告解问答部分按天主教十诫，逐条展开。三者均为葡-汉对照，汉语部分采用拉丁字母拼写，全篇无汉字。

这一部分无总标题，亦无作者信息，或许因此魏若望统计傅圣泽手稿时未作收录，亦未收入其它任何书目。但近年其他学者发现的另两部分内容高度近似的传教士手稿可对其来龙去脉提供一些线索：其一是柏理安在葡萄牙里斯本科学院图书馆（Academia das Ciências）发现的题为 *Vera et Unica Praxis breviter ediscendi, ac expeditissime loquendi Sinicum idioma* [快速简捷学说汉语的唯一真正方法] 的手稿<sup>19</sup>。该手稿有 1698-1702 和 1704-1707 年间两度任葡萄牙耶稣会中国副教省长的孟儒望（Jose Monteiro, 1646-1720）的署名，亦纯用葡语和拉丁字母拼音，无汉字，包括语法、词汇表、告解问答三部分，正可以对应傅圣泽手稿中的语法、词汇表和告解问答。经对比，两个版本的告解问答文字完全吻合，各章标题措辞乃至顺序也几乎完全一致，唯傅圣泽抄本有一张天文学数学词汇表[f°122]，为孟儒望本所无。

傅圣泽本与孟儒望本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增加了九篇共长达三十叶（约两万字）的情景会话。为这部分内容提供参照的则是台湾学者李毓中、张巍译在西班牙 Alcala de Henares 耶稣会托雷多教区总档案馆新发现的一份无标题手稿<sup>20</sup>。手稿无署名，但根据全卷除开篇三叶法文《Instruction pour les Visites des Mandarins (拜会华官指南)》判断，抄写者应为法国人。全卷主体为 114 页情景对话，与傅圣泽抄本的会话部分内容完全吻合，仅偶有个别字词相异，所不同的是，西班牙版纯用汉字书写，中文字迹工整流利，为华人代笔抄写的可能性很大。无西文翻译，仅部分文字有拉丁字母注音。李毓中、张巍译判定手稿的完成应在 1699 年之后，但各篇对话或分别由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传教士撰写，其中至少两篇可

---

<sup>19</sup> 索书号 Manuscrito Azul 420。柏理安在其 2006 年与杜鼎克博士合撰的论文中用英文发表了语法和词汇表部分的小标题 (pp. 186-190) 和篇尾告解手册 (*Confessionario*) 的全文 (pp. 199-239)。Brockey, L. M. & Dudink, A. (2006). "A Missionary Confessional Manual: José Monteiro's *Vera et Unica Praxis breviter ediscendi, ac expeditissime loquendi Sinicum idioma*" in N. Standaert & A. Dudink (ed.) *Forgive Us Our Sins: Confession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hina*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pp. 183-239。笔者感谢柏理安教授在通信中确认了两份手稿内容的相似性及不同点。

<sup>20</sup> 李毓中、张巍译，《洋“老爷”的一天：从〈拜会华官问答[汇编]〉看明末耶稣会士的日常生活》，《清华学报》即将发表；李毓中等，《〈拜会华官指示〉点校》，《东亚海域交流史》，2015 年第一卷即将发表。笔者感谢李毓中教授惠赐论文及资料照片。

判定为明末作品。

综合考察傅圣泽手稿中各篇汉语教学材料，它们大致涵盖了汉语启蒙阶段所需的各类知识，其系统性、丰富性以及各篇之间的互补性，足以见证在华传教士汉语训练经过一个世纪的积累成果。尽管成书的时间不一，有侧重理论和实践的区别，作者显然不只一人，不同作者之间未必有过交流，但其中一些突出的共同点，应该也能反映当时传教士对汉语教学的轻重缓急的某种共识：首先，所有例词例句均来源于日常生活与教会事务，如这段神父与其中国仆人关于兑换铜钱的对话（f75v），事无巨细，锱铢必较，绝无高深抽象的学术思辨，却是传教士在华日常生活细节难得的见证<sup>21</sup>。

<p>Mai pan tiě sù 買辦的事<sup>22</sup></p> <p>P. Meù gîn, nì lâi, nì jû kîn quòn <u>mài<sup>2</sup> pán tiě sù</u> <u>vú.</u></p> <p>[神父 (P): 某人, 你来, 你如今管买办的事务。]</p> <p>M. Lào yê, fuén fòu, siào tiě, tsâi hào khué mài.</p> <p>[某人 (M): 老爷吩咐, 小的才好去买。]</p> <p>P. Kîa li mǒ yeòu, <u>tông tsiên</u>, míng gě cāi k'ü huón<sup>2</sup> sîa tsiên<sup>3</sup>, in sién c'án yě c'an, nā yn tsù, hào pòu hào, huón tiě tsiên, huón pòu tiě.</p> <p>[P: 家里没有铜钱, 明日该去换些钱, 应先看一看, 那银子好不好, 换得钱换不得。]</p> <p>M. Lào yê, Tchê cò yn tsù t'chā sie yn <u>choui<sup>2</sup></u>, huón tsiên tiě yn tsù, toū yaó <u>si<sup>3</sup> sū</u>, tché có yn tsù tché<sup>4</sup> yeòu kièu lh, kièou sãn, tchín sě, mèn pú tiě, t'ā yáo pòu tsǒ yn chouié, pòu gên pòu k'eng huón tsiên.</p> <p>[M: 老爷, 这个银子差些银水, 换钱的银子都要十足, 这个银子只有九二、九三成色, 蒙不得, 他要补作银水, 不然不肯换钱。]</p>	<p>Couzas do Comprador</p> <p>P. Fulano, vos vinde vos agora teneis cuidado. do officio de comprador<sup>2</sup>.</p> <p>M. O Padre, mandar em seu criado entao he bom ir comprar.</p> <p>P. Em caza nao ha de cobre caixas<sup>3</sup> ; A manham, convem ir trocar<sup>2</sup> algumas caixas<sup>3</sup>, vos primero olhai, aquella prata, se he boa ou nao, se pode trocar caixas ou nao pode.</p> <p>M. O Padre, este prata, falta<sup>1</sup> lhe algumas couzas dos quilates<sup>2</sup>, a prata de trocar caixas. Tuda deve ser fina<sup>3</sup>, esta prata somente<sup>4</sup> tem 92, 93 quilates. excusarse nao pode, que elle queria refazer se, do que falta. de outra sorte nao querera trocar caixas.</p>
---	---

<sup>21</sup> 对Alcala手稿所反映的更多传教士日常生活状态，参加李毓中、张巍译文。

<sup>22</sup> 文中汉字为笔者所加。有趣的是，这篇双语对话的汉语部分相当明白晓畅，葡语部分却相当生涩，有时似乎是汉语硬译的结果，如将汉语“换得换不得”译为“se pode troxar ... ou nao pode”。



P. + ngo tché lí yeóu yáo tchě <sup>1</sup> quouēi póu jú pa <sup>2</sup> siē sí sū yn tsu, k'ui liēou tché có yn tsù. mài piě yám tōng sī. [P: 我这里有要吃亏, 不如把些细碎银子, 归 (?) 了这个银子, 买别样东西。]	P. Eu aqui tambem hei de ter <sup>1</sup> perda, melhor he tomar <sup>2</sup> , hum pouco de fina prata, levala e deixar. este prata para comprar outra casta de cousas.
---	--

再例如这份有关动物的词汇表 (F°120v): 其罗列的词条, 自“老虎”、“豺狼”, “猫”、“狗”乃至“虱子”、“跳蚤”之属, 绝不见龙、凤、麒麟等祥瑞。

animais en geral	kîm chéou 禽兽 + tchou sîng 畜牲 + sing k'èou 牲口
pelle	pî 皮
tirar a pelle	p'ō pî 剥皮
morder de animais	yào 咬
prender com a mas ou arrachar	tchouā 抓
cane	keou 狗 + keou tsù 狗子 + kiuèn 犬
gato	māo tsù 猫子 + māo lh 猫儿 + māo 猫
Rato	lào tsù 老鼠 + hao tsù 耗子
O gato matou hum rato	māo yaò leaò yi cò lào chù 猫咬了一个老鼠
formiga	mà y 蚂蚁
formiga branca	pě mà y 白蚂蚁
piolho	sē tsù 虱子
pulgas	tiaó tsaó 跳蚤
tigre	lào hòu 老虎
lobo	tsai lāng 豺狼

傅圣泽的抄本中的这套教材另一个值得留意的共同点是, 各篇均纯用拼音而无汉字。由此看来, 汉字的读写能力, 至少在启蒙阶段, 不是传教士汉语学习的重点, 甚至是不被鼓励的。对此万济国本人曾有一番直率的解释:

“我认为这里插入汉字是不合适的。这一方面会引起混淆, 另一方面也无必要, 因为这里的所有词汇都是备口语之用。若有人需要用中文刊刻发行书籍, 他可以使用本书中的词汇, 口述给一个中国文人, 后者随后可以查对出合宜的汉字<sup>23</sup>。”

综上, 这套教材的目的, 应当是使初到中国的传教士能尽快独立管理教堂内外一应日常实务, 属于“实用语言技能速成”, 为了求快, 只能牺牲汉字的学习 (当然, 这不代表在

<sup>23</sup> Coblin, W. S. (2006). *Francisco Varo's Glossary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p. 16. 不过, Alcalá纯汉文手稿的发现应该也反映出传教士内部对是否学习汉字存在不同看法。

---

传教士在熟练掌握了口语后可以进一步学习汉字)。这与今天对外汉语教学通行的听说读写并进的方法相左,与利玛窦等人饱读诗书的“西儒”形象有不小的落差,甚至和傅圣泽本人在汉学史上留下的孜孜钻研古经的形象相去甚远。但这恐怕更真实地反映当时大多数在华传教士的当务之急:他们在远离宫廷的华南沿海省份,与之交接的中国人,上不过地方官员、乡绅、生员,其余应多为普通平民。从教材内文提及的各类职业,大致也可勾勒出教材所针对的传教士的社交范围:语法部分有“职业名称表达法”一节,所列举的职业包括“开铺的”、“打铁的”、“剃头的”、“木匠”、“银匠”、“马夫”、“轿夫”、“买卖人”;词汇表中有两篇以职业为题,分别为“农人和农活”(f°119v)、“石匠和木匠”(f°121)。传教士用中文交流的首要对象,恐怕还是在教堂服务的中国仆役:情景对话中的八篇均为神父吩咐“某人”料理教堂或住院日常事务。(不过,就目前所知的史料,无法判断是否存在过专门适用于宫廷传教士的汉语教材。)

#### 教学方法还原

那么,初学者又是如何使用这套教学材料来达到实用汉语速成的目的呢?

教材的手抄本形式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线索:学书的第一步是抄书。抄写和听记在当时欧洲耶稣会书院是重要的教学手段,这一习惯显然也被传教士带到了中国。与傅圣泽同时代的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在其语法名著《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的前言中曾批评道,年轻传教士“一到中国,就急于寻找一本手书的中西文对照字典,并且花很多时间来抄写。如果他们一开始就阅读和学习四书,他们的时间将可能得到更好的利用<sup>24</sup>。”然而,仔细比较本文所涉及的各份材料便会发现,抄写的具体形式有多种:可以是原封不动的机械复制,也可以包含对原文的大幅度改写。傅圣泽抄本与里斯本的孟儒望本和西班牙Alcala抄本相比,对应篇章无论是拼音还是汉字书写,具体内容均几乎一字不差。这种“忠实”的传抄,对于传教士的某些汉语教材和语言训练应该起到了一定的标准化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比较傅圣泽的拉丁文抄本和万济国语法的西班牙语印本可以发现,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极大,已远不能用疏漏或误译来解释。可以肯定的是,万济国语法“原版”是西班牙语书写,完稿与1682年<sup>25</sup>。而傅圣泽抄本的标题也清楚表明,拉丁文版是“译本”,完成于1684年。二者使用的语法概念系统相同,但全书的章节顺序经过了彻底重组,且半数以上的例句截然不同。例如,在解释“名词属格”在汉语中的表达时,二者对白话虚词“的”的举例均为“天主的恩”(拉丁语**beneficium Dei Tiēn tchù tiě ngēn**,西班牙语版**beneficio de Dios Tiēn chù tiě [n]gēn**),而对文言虚词“之”,则拉丁语版例句为“玛丽亚天主宠爱之母”(Maria mater gratiae, *malia tiēn tchù tch'òng ngái tchī mòi*, f°26),而西班牙语版为“天主之子”(hijo

---

24 马若瑟《汉语札记》序,转引自龙伯格, p. 92。

25 1703年印本篇末有“1682, 福安”落款。Coblin & Levi p. 213.



因之一，因为显然，傅圣泽抄本曾经过法语母语者的改写。首先，如下表所示，傅圣泽抄本的拼音系统是以法语正字法为基础的，而西班牙语刊本拼音则是以西班牙语正字法为基础（如前者将元音[u]拼做ou，后者拼做u）。

现代汉语拼音/汉字	拉丁文版拼音	西班牙文版拼音
zi 子	tsù'	çhù
zhun 准	Tchùn	chùn
jie 接	tchiě	çh'iě
ran 然	gîn	jên
mu 母	mòu	mù
fu 夫	fōu	fū
shen 身	chīn	xīn
shang 上	cháng	xáng

其次，尽管语法主体完全由拉丁文撰写，但汉语例句的翻译偶有法文出现，且常伴以第一人称复数“如**我们**法语中说”（**dicimus gallice**）字样。这种情况多出现在万济国语法西班牙语版所无的语法点中，全文有七处，这里仅举一例：

De Particula ty [论小品词“替”]

Significat facere pro alio, non tam illus loco, quam in illius gratiam, quod v.g. dicimus gallice, **achetez moy cela**, t'y ngò mài, **faites moy cela**, ty gnò tsó. **Confessez le** ty t'ā kiài tsóui, christus redemit nostra peccata jē sōu ty ngò mên chō ngò tsóuy, **ie te ferai cette affaire**, ngò ty ny tchō tchě kó sú, **lavez moy cet habit**, t'y ngò sí tchě yě ling y fō. et sic de multis aliis.<sup>29</sup>

[（“替”）意为代他人做事，不仅是顶替他人，更是嘉惠于他人。如我们法语中说，**achetez moy cela**，替我買，**faites moy cela**，替我做，**Confessez le**，替他解罪，**christus redemit nostra peccata**，耶稣替我们赎我罪，**ie te ferai cette affaire**，我替你做这个事，**lavez moy cet habit**，你替我洗这领衣服，等等。]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傅圣泽抄本脱胎于一个法国传教士群体，那么相应的，万济国语法的印本应当是西班牙传教士群体的产物（万济国和石铎禄都是西班牙人）。前引捷克传教士严嘉乐书信中也曾提到的一部“波兰方济各会修士”编写的、针对捷克和波兰人的汉语语法，可以为这一现象增加一条旁证<sup>30</sup>。

如此看来，传教士汉语教材的流变似乎包括几个矛盾统一的现象：教材一方面被忠实

<sup>29</sup> 文中粗体字为笔者所加。手稿中拉丁文和法文部分没有外观上的区别。

<sup>30</sup> 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大象出版社，2002，丛林、李梅译，p. 16。

---

抄写、刊刻、标准化，一方面也被积极增删改写；一方面，汉语教材撰著主要采用传教士群体中的拉丁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通用语，另一方面，不同母语的传教士又进一步改写了教材，以适应各自的语言习惯。

但显然，没有任何人能通过闭门抄写教材而学通一门语言，尤其是傅圣泽抄写的教材所教授的首先是日常交流所用口语。我们如何从书面形式的史料中还原口语教学的过程？至此，史料的局限性开始显露出来了。很遗憾的是，傅圣泽抄本几乎“过于”整洁。抄本中完全没有留下任何个人化的评注，记号，连涂改都极少，仅在葡汉对照的情景会话部分偶然能看到一些将汉语词汇与其葡语翻译挂钩的数字（如上引关于银钱兑换的对话）。傅圣泽福建期间的日记也未留下任何有关其汉语启蒙的记录。我们只知道，他在福建期间接触的传教士中不乏汉语水平优异者，如同为法国耶稣会士的刘应（Claude Visdelou, 1656-1737, 1687年入华），傅圣泽在1700年曾与之同在福州达九个月，如曾师从其学习汉语也在情理之中，但这只是推测，没有任何证据。

有案可考的，却是传教士身边的中国仆人作为汉语母语者，在传教士口语学习的过程中发挥的试金石作用。在1702年的一封信中，傅圣泽写道：

当我去抚州时，我将南昌的事务交给顾铎泽神父、汤尚贤神父和方全纪神父。在我不在的四个月里，他们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他们到达中国的时间还很短，勉强能说几个中文单词，但他们一直勤奋专心地努力学习一些向基督教徒宣传上帝的事迹所必需的词语。他们找来我们的佣人，在他们面前复读他们背熟的词句。熟练之后，就在大庭广众面前大胆地宣讲这些话。上帝赐福于他们的美好动机，当我返回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已经给四十九个人施了洗礼<sup>31</sup>。

## 结语

傅圣泽的这部抄本为我们理解十七世纪末的传教士汉语学习提供了难得的细节信息：包括入门阶段的教学目标、教材的使用和流变、手抄本和印本的区别、担任媒介语的欧洲语言、不同国籍、不同修会传教士间对教材的分享、老一辈传教士与中国助手的角色。但最后，我们不可避免需要简单讨论其代表性问题。傅圣泽的人生轨迹在传教士中绝对属于特例（也正因为此，他的私人档案才得以保存至今），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认为他入华之初的汉语启蒙过程有任何异于侪辈之处。这套教材中的语法、词汇表、情景会话等各个单元都能在其它与传教士相关的档案中找到流传的证据，其内容所涉及的日常生活和教会事务词汇也显然不限于一时一地传教士之用。把这套语言教学材料看作十七世纪末华南沿海传教士共享的知识，应不为过。

如果说语言是一种社会性知识的话，那么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汉语知识结构，反映的就

---

<sup>31</sup> 耶稣会传教士傅圣泽神父致法国贵族院议员德·拉尔福斯公爵的信(1702年11月26日于中国江西省首府南昌)，《耶稣会士中国书简：中国回忆录（卷一）》，郑德第，吕一民，沈坚译，pp. 221-222。（引用时根据法文原文有所校订）。

---

不单纯是知识的客观积累，而更是传教士与中国社会互动方式的反映。这批教材在汉语官话与方言、口语与文字、白话与文言之间的选择，对中国社会职业、地方特产、自然物种的罗列，对生活实用语言知识的传授，都更加丰富了我们西方传教士入华这一进程的理解。传教士群体本身也是一个参差百态的社会，这些语言教材被来自不同国家、操不同语言的传教士编纂、增删、翻译、抄写、刊刻、使用、流传、湮灭，其本身也构成了一部社会书籍史，折射出传教士群体组织运作、知识传承机制的变迁和调试。毕竟，语言学习的过程本身也是人与人交流、互动的过程，而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最终也要归结于具体个人的经验。本文在有限的篇幅内仅能作个案的讨论，但希望管窥之见，能未来进一步的研究作一些铺垫。